



商周青铜纹样的演变及其文化映射

范硕, 杨雪儿, 马一心, 谢雯, 祝成炎, 张红霞

(浙江理工大学, a. 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b. 纺织纤维材料与加工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c. 浙江省纤维材料和加工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 杭州 310018)

摘要: 中原地区作为商周文化的核心区域, 其青铜器纹样种类繁多, 是商周文化的重要载体。该研究以中原地区商周青铜纹样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纹样的组合规律、组织结构与装饰风格三个角度分析, 旨在揭示青铜纹样的演变特征, 并探讨其与商周文化之间的映射关系。研究表明, 从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 青铜纹样受观念和礼制的影响, 经历了从简单的单层带状二方连续几何图案, 到复杂的多层二方、四方连续动物纹样, 再到简化的单层带状二方连续几何纹样的演变过程。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古人从图腾崇拜到尊神重鬼, 再到尚德保民的思想演进, 也映射出商周时期政治背景与思想文化的深刻变迁。该研究可为现代青铜纹样的创新设计提供参考借鉴, 并有利于商周青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青铜纹样; 商周青铜器; 演变特征; 文化映射;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J5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5)02-0104-08

The evolution of bronze patterns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their cultural mapping

FAN Shuo, YANG Xueer, MA Yixin, XIE Wen, ZHU Chengyan, ZHANG Hongxia

(a.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Textile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b.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 for Textile Fiber Materials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c. Zhejia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Fiber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area of Shang and Zhou culture, the central plain reg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culture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Focusing on the bronze pattern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he article aims to reveal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bronze patter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attern combin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decorative style, and to explore their mapping relationship with Shang and Zhou cultur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rom the early Shang Dynasty to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bronze patterns were influenced by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ritual systems, and gradually evolved from simple geometric patterns with single-layer strip and two-dimension continuity to the complex animal patterns with multiple layers and two-dimension or four-dimension continuity, and then tended to simplified geometric patterns with single-layer strip and two-dimension continuity. The evolution not only reflects the ancient people's ideological evolution from totem worship to

收稿日期: 2024-08-2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NSFC52203074); 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茧丝绸)项目(浙财建[2024]99号); 浙江理工大学本科业务费立项项目(2023330001004290)

作者简介: 范硕(1992—), 女, 杭州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功能性纺织品设计与开发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张红霞, E-mail: hongxiangzhang@126.com

reverence for gods and ghosts, and to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of esteeming virtue and protecting people,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found changes of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ideological culture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To sum up, the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sign in modern bronze patterns and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hang and Zhou bronze culture.

Key words: bronze patterns; bronze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mapp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青铜时代的文明,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原地区,作为商周文明的核心地带,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青铜艺术。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以其精湛的工艺、独特的造型和神秘而瑰丽的纹样,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思想理念与审美追求。青铜纹样不仅是青铜器的装饰性元素,更是商周时期社会理念、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的强烈反映,成为商周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纹样与器型的和谐统一,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彰显了商周时期工匠们精湛的创作技艺和超凡的工艺美术智慧。这些艺术作品不仅在当时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目前学术界已取得一些关于青铜纹样的研究成果。张庆等^[1]从题材、构图等角度分析商周兽面纹与楚国丝绸中的蟠龙飞凤纹,证实了商周纹样和楚国纹样之间存在清晰的传承与发展脉络;黄厚明^[2]从形式与内涵的同构关系解读商周青铜器纹样,构建了形式与内涵两种视野下的“关系美学”理论体系;艾兰等^[3]探析郑州商城青铜大方鼎的造型与纹饰演变,指出方鼎的纹饰经历了由模仿性向装饰性发展的过程;齐秀芝等^[4]借助信息量化软件,运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对青铜研究的热点及发展前沿进行研究,为青铜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喻晓辉^[5]重点分析了商周青铜纹饰的特征组成、装饰图案及演化过程;常冉等^[6]运用形状文法设计青铜纹样,并将其应用于丝绸文创产品中;王珺英^[7]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实现青铜艺术元素的跨界融合并加以实践。目前学术界对商周青铜纹样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学特征及创新设计等方面,而对商周青铜纹样的演变特征及其文化映射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以青铜器图像和古籍文献资料为依据,通过分析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青铜纹样的艺术特点,探究青铜纹样在组合规律、组织结构以及装饰风格的演变特征,挖掘纹样与其蕴含文化内涵之间的映射关系。

一、商周青铜纹样的艺术特点

商周时代,青铜器铸造工艺极为繁复精细。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种类繁多、题材丰富,蕴含着当时社会在宗教、政治、礼法、审美等诸多方面的信息。青铜纹样依据题材可主要分为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两类,具有对称性、重复性、层次性等构成特点。本文从青铜纹样的主要类型、构成特点等方面对其艺术特点进行论述。

(一)商周青铜纹样主要类型

1. 动物纹样

动物纹样,是青铜器上最具标志性的图案,也是其主要的装饰元素。动物纹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直接取材于自然界的写实动物形象,如蝉纹、象纹、鱼纹等,它们以生动的形态展现了自然界的生灵;另一类是变形奇特、充满幻想色彩的神异性动物纹样,其融合了多种现实动物的特征,创造出虚拟的神话生物,如兽面纹、凤鸟纹、夔龙纹等,它们被古人赋予了神圣的象征意义。

在这些动物纹样中,兽面纹尤为突出,它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中数量最多,占据着核心地位,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兽面纹如图1(a)所示,旧称饕餮纹。古人融合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通过想象创造出一个较完整且独特的饕餮头部形象^[8]³⁴。兽面纹通常以鼻梁为中线,左右严格对称,常表现出横眉裂口、宽鼻瞪目的形态,并以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作为重要标志。整体形象奇异威严,呈现出“狞厉的美”^[9]¹⁷¹。角形也是兽面纹的重要特征之一,其角并非特指某一种动物的角,而是包含牛角、羊角、鹿角、龙角等多种形式。

凤鸟纹如图1(b)所示,包括凤纹及各种鸟纹,通常以华丽羽饰展现鸟类的优雅姿态。这些纹样中的头部装饰高耸或低垂的羽冠,躯体则伴随着修长的尾翎垂落,或尾部卷曲上扬,展现出前视状或回首状的姿态^[8]¹³⁴。这些形态不仅充满了活力与灵动,还蕴含着安康与吉祥的象征意义,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夔龙纹如图1(c)所示,是由龙纹演变而来的。其主要形态与蛇近似,通常以爬行状的龙形侧面图像呈现,形态特点为大口、卷唇、一角、卷尾、一

足,偶尔也能看到有两足或无足的形态。夔龙纹常以两两相对的形式出现在器物上,具有古拙美感^{[8]186}。



图1 商周青铜器动物纹样示例^①

2. 几何纹样

几何纹样,其灵感多源于自然现象或动植物的形态特征,通过点、线、圈和角等元素的巧妙组合和变形,排列成一种独特且颇有韵律感的装饰性图案,如云雷纹、窃曲纹、涡纹、瓦纹等。云雷纹由连续的“回”字形线条构成,有呈圆弧回转式及呈方形回转式^{[8]226},如图2(a)所示,常作为青铜器纹饰中的地纹,用于衬托主纹,营造出精密繁缛的艺术效果。窃

曲纹是由鸟纹、龙纹演化而来的抽象几何纹样,通常由两端弯曲回钩形成的“C”形或“S”形线条组成,并排列成扁平的长条状图案^{[8]184},如图2(b)所示。涡纹则形似圆形的太阳,中间有一个实心圆点,边缘环绕着三至八条旋转状的弧线^{[8]196},象征着光焰的流动^[10],如图2(c)所示。这些几何纹样不仅增添了青铜器的艺术魅力,也反映了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深刻理解与审美追求。



图2 商周青铜器几何纹样示例^②

(二) 商周青铜纹样构成特点

1. 对称性

结构布局上,青铜纹样呈现出严格的左右对称特征。其图案以中心点为基准,两侧或上下部分呈现出镜像对称的效果,体现出一种均衡感。该结构最能凸显出青铜艺术所追求的庄重与威严之美,传达出严谨沉稳的感受。例如,在兽面纹中,以鼻梁为中轴线,两边的目、眉、耳、兽口和兽腮等元素都严格对称。这不仅增强了纹样的视觉冲击力,也赋予青铜器庄重高贵的气质。另外,夔龙纹常以两个侧面形象与兽面纹进行组合,共同构成一个正面头部形象。这种组合设计既能表现出正面视图,又能展现其对称的侧面视图,不仅增强了青铜器的视觉冲击力,而且反映了古人对秩序与和谐的追求。

2. 重复性

艺术风格上,青铜纹样所蕴含的节奏与韵律之美,往往通过特定图案的重复排列来体现。这些图

案通常以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方式不断重复排列,创造出一种富有韵律的视觉效果。这种设计不仅丰富了青铜器的装饰性,也透露出一种内在的和谐与节奏感。在装饰纹样中,线条、方块、圆圈等元素通过连续排列、镜面对称等手法,呈现出规律与重复的构成形式。例如,云雷纹、窃曲纹、环带纹等几何纹样因其使用频次极高而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纹样通过高度概括和简化,以及点、线、面的巧妙结合,以多种不同的重复方式排列,营造出主纹与地纹之间的节奏和韵律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如同行云流水,将意匠之美发挥到极致^[11]。

3. 层次性

造型手法上,青铜纹样的布局整体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层次感。主体纹样与辅助纹样紧密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兽面纹等主体纹样凭借其显著特征,成为引人瞩目的视觉焦点,而其周围则巧妙地搭配以云雷纹等辅助纹样。在较粗的主纹上

① 样式(a)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34. 样式(b)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34. 样式(c)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86.

② 样式(a)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226. 样式(b)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84. 样式(c)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96.

勾刻细线,以此强调主体,丰富层次感,营造出主次分明的效果。青铜器的浮雕工艺进一步强化了纹样的立体感与层次感。借助深浅不一的浮雕效果,纹样在器物表面的高低起伏中展现出各异的层次,深浅浮雕相互烘托,使得青铜器的视觉效果更为立体生动。在空间布局层面,纹样展现出层次递进的成效。诸如器身与器盖、口沿与腹部等部位的纹样,皆存在明显的层次差异。纹样的布局构成与青铜器器型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完整的艺术表达。

在青铜装饰艺术的巧妙构思中,纹样形式的繁复与简约必须达到完美的平衡,与器具造型的流线美融为一体,并与其用途功能紧密契合。唯有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方能充分展现青铜器独特的内涵与非凡的魅力。

二、商周青铜纹样的演变特征

青铜纹样的诞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纹样时期,在历经不同时代的传承与演变后,丰富的纹样与独特的造型相互交融,从而铸就了别具一格的青铜艺术风格。如果将各类纹样按照历史时代依次排列进行比对,便能够清晰地映射出社会观念与礼

制制度的变迁轨迹。本文从青铜纹样的组合规律、组织结构以及装饰风格等方面探讨其演变特征。

(一)组合规律演变

商周青铜纹样不断演进,从商代早期的简约几何图案,发展至商代晚期的繁复兽面纹,而后又转变为西周的变形几何纹样,这一过程映射出青铜铸造技术的逐步提升以及审美观念的变迁。在商代早期,青铜器主要呈现出素面特色,其纹样以简单的几何图案为主。此时,兽面纹的形态已初步形成,不过是由较为粗犷的弯曲回旋线条勾勒而成,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冶炼技术尚未成熟,无法达到后期的精细程度。商周青铜纹样组合规律演变情况见表1。从表中可知,商代早期纹样的组合形式较简单,多为“素面+弦纹”,偶有复杂组合如“弦纹+乳钉纹+弦纹”,方鼎出现了“乳钉纹+兽面纹”的组合形式。商代中期,见证了青铜艺术的飞跃。核心纹饰逐渐聚焦于兽面纹,这一时期兽面纹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其一,承袭商代早期风格,对变形兽面纹进行精细改进;其二,引入了繁复密集的云雷纹和排列有序的羽状纹,共同构成新颖的兽面纹。此时,纹样多流行“素面+兽面纹”“弦纹+连珠纹+兽面纹”的组合形式。

表1 商周青铜纹样演变特征

年代	组合规律	组织结构	装饰风格
商代早期	素面+弦纹, 弦纹+乳钉纹+弦纹, 乳钉纹+兽面纹	单层带状二方连续	古拙粗犷
商代中期	素面+兽面纹, 弦纹+连珠纹+兽面纹	单层带状二方连续	古拙粗犷
商代晚期	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 兽面纹+连珠纹, 夔龙纹+云雷纹	三层二方、四方连续	凝重繁丽
西周早期	兽面纹+凤鸟纹+云雷纹, 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 夔龙纹+涡纹	三层二方、四方连续	凝重繁丽
西周中期	凤鸟纹+几何纹, 夔龙纹+几何纹, 窃曲纹+瓦纹	单层带状二方连续	典雅疏朗
西周晚期	窃曲纹+瓦纹+横鳞纹, 窃曲纹+环带纹+瓦纹	单层带状二方连续	典雅疏朗

商代晚期,纹饰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神异性兽面纹得到空前发展。在这一阶段,兽面纹种类丰富,数量庞大,地位最显著。在流行的组合纹样中,兽面纹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常与夔龙纹等灵活搭配,形成诸如“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兽面纹+连珠纹”“夔龙纹+云雷纹”等多种组合形式。在以动物为主题的纹饰里,兽面纹通常占据中心位置,

成为主要装饰纹样。其两侧偶尔搭配夔龙纹或凤鸟纹,云雷纹则以地纹的形式出现,与主纹形成强烈对比。商代晚期的夔龙纹普遍处于从属或陪衬地位,极少作为主纹装饰在器物的显眼部位,几乎始终是兽面纹的附属纹样。然而,在没有兽面纹的情形下,夔龙纹的地位则相对较高。

在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纹饰艺术迎来了其发

展的黄金时期。虽经历了朝代更迭,但统治阶级借助礼器来巩固统治、引导社会思想的策略一脉相承。这一时期的兽面纹不仅继承了商代晚期兽面纹风格,也标志着兽面纹作为纹饰主流地位的逐步确立。纹样的组合形式大体上继承了商代晚期的规律,云雷纹继续作为衬托主纹的背景纹样,常见的组合包括“兽面纹+凤鸟纹+云雷纹”“兽面纹+夔龙纹+云雷纹”以及“夔龙纹+涡纹”等。西周中期是青铜纹样的转变期,此时兽面纹的数量显著减少,或仅出现在青铜器的足、耳等次要部位。纹样组合以“凤鸟纹+几何纹”和“夔龙纹+几何纹”为主,并出现了“窃曲纹+瓦纹”的新组合。到了西周晚期,夔龙纹和凤鸟纹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瓦纹等变形几何纹样,纹样组合发生了显著变化,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风格。这一时期的纹样组合以“窃曲纹+瓦纹+横鳞纹”“窃曲纹+环带纹+瓦纹”或多种几何纹样的集合为主,展现了西周纹饰艺术的独特魅力。

(二)组织结构演变

青铜纹样的组织结构丰富多样,其平面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三种类型:适合纹样、独立纹样和连续纹样^{[12]146}。适合纹样主要是根据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来刻画相应的纹样,从而使纹样与青铜器造型达到和谐统一。独立纹样中以平衡对称式最为常见,从商代早期至晚期,大多数兽面纹都采用这种形式。连续纹样里以二方连续式最为常见,在商代早期便已有应用,例如器物腹部所饰兽面纹上下的小圆圈纹。到了商代晚期,大多向左右两方反复连续,而四方连续式则多见于乳钉雷纹。西周早期仍以独立纹样作为主要装饰,兽面纹采用平衡对称式。在西周中期,一些凤鸟纹采用半旋转的独立纹样布局。带状二方连续式纹样在西周后期运用较为普遍,其布局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散点排列法,像“C”型窃曲纹、涡纹、鳞纹等采用此方法;另一种是采用交错和联结的骨骼布局,环带纹、“S”型窃曲纹常常采用这种方法形成二方连续式纹样。

青铜纹样浮雕结构主要分为单层结构和三层结构。在商代早期,青铜纹饰的设计相对简单,通常以单层线条雕刻纹样为主,形成了阳纹(凸起部分)和阴纹(凹陷部分)的互补与和谐。这些纹样多以带状形式环绕器物的壁面或圈足,而器物的其他部分留白较多^{[12]144}。到了商代晚期,纹饰变得更加复杂,呈现出多层次的花纹设计,即所谓的“三层花”或“三叠法”装饰风格,其中“三叠法”纹样示例^{[8]68}如图3

所示。这一时期的纹样线条流畅且变化多端,追求丰富的层次感和视觉冲击力。



图3 商代晚期“三叠法”纹样示例^①

在商代晚期,“三叠法”的出现使青铜器上精密的花纹能够得到细腻的展现。以下对图3纹样示例进行分解,其构成样式如图4所示。在云雷地纹和浮雕主纹的基础上,于凸起的主纹上再刻画阴纹装饰线,构成三层花纹,使整体纹样呈现丰富立体的层次效果^[13]。青铜器的纹饰唯有与自身器型相契合,方能实现理想的装饰效果。古代工匠不断进行实践,并逐渐发展出了“因器制宜”的布局形式。在商代晚期,多数青铜器全身施有纹饰,组成的纹样不仅装饰在青铜器表面的显著部位,就连视线不易触及的底部也加以点缀。若对青铜器进行全身装饰,必要时需划分出多个独立的装饰面。在每块装饰面中,纹样均为“单独适合纹样”^[14]。这种划分装饰块面的方式,是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典型特点,使得青铜器造型与纹饰达到完美统一和繁缛富丽的视觉效果。而在西周中晚期,单独适合型的满纹装饰较为少见,纹样表现多为单层结构,基本上不见“三叠法”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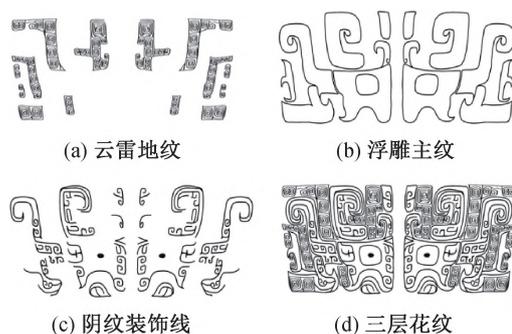


图4 商代晚期“三叠法”样式图

注:图例来源于笔者绘制。

(三)装饰风格演变

商周时期青铜纹样经历了由简单走向繁缛,再到简约的演变过程。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受限于铸造技术,主要呈素面特色,纹饰多为凸起的单层带状,线条流畅而轻盈,整体造型展现出简洁而庄重的特点。商

^① 图片引自:周泗阳,万山.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68。

代早期青铜纹样示例如图5所示,其结构严整而规整,风格偏向简约,整体传达出一种古拙粗犷的审美感受^{[8]15}。尽管商代中期是青铜纹样艺术的飞跃时期,但其基本风格仍然延续了早期的古朴粗犷特点。



图5 商代早期青铜纹样示例^①

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动物纹极为流行,其中以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为主流。它们的形象或抽象,或写实,或夸张,或简洁,或繁密。其中兽面纹具有巨睛阔嘴、额鼻隆起的特征,总体风格狞厉肃穆,与当时盛行的崇鬼敬神观念有关。夔龙的外形则巧妙贴合了青铜器饰面的结构线,呈现出古朴而庄严的气质。而器表的扉棱和“三叠法”的装饰花纹使青铜器视觉效果更加华丽。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全形拓片示例^{[8]5}如图6所示。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以其均衡稳定的造型、敦实厚重的质感以及精致繁复的纹饰,散发着凝重繁丽的审美气息。



图6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全形拓片示例^②

西周中晚期为青铜艺术的转变期,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产生了巨大分野,大多数纹样趋于简化,有祛华返朴之势。如图7所示的西周中晚期青铜纹样^{[8]184},单层花纹的表现手法和窃曲纹等抽象几何纹样的流行,共同塑造了西周中后期规整有序、流畅自然、朴素无华的艺术风格,这与前期那种华丽凝重、繁复华美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转变并非有所逊色,而是展现了一种与前期风格截然不同的新趋势,使得作品的神秘感减少,理性感增强,整体上给人以一种优雅、开阔的审美感受。

三、商周青铜纹样的文化映射

青铜纹样并非仅仅出于审美目的,而是在商周时期特殊的政治背景与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之下形

成。商周时期的艺术总体可归为“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青铜器不但以其独特气质对华夏文明产生了数千年的深远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它承载着政治制度与精神追求。本文探讨青铜纹样所映射出的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背景,即思想观念与礼制的背景。



图7 西周中晚期青铜纹样示例^③

(一)图腾崇拜的精神信仰映射下的青铜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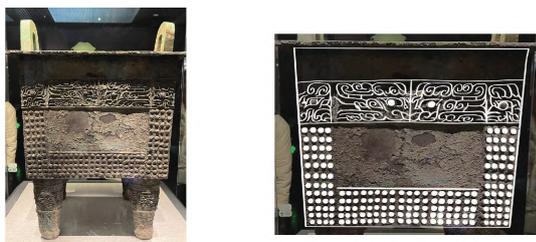
青铜纹样的诞生可追溯到史前时代的陶器纹样。李泽厚^{[9]173}认为,陶器上的抽象几何图案不仅蕴藏深厚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意义,而且包含复杂的观念和丰富的想象。随着史前文明的落幕,夏朝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左传·宣公三年》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其中“远方图物”很可能是对史前社会宗教巫术观念的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夏人对青铜纹样的早期审美倾向——对图腾美的追求^{[12]164}。图腾是人们对自然界崇拜的象征,早期人类对自然界神秘莫测的力量充满敬畏,因此创造了如饕餮、夔龙、凤鸟等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神话生物。这些虚构的生物被赋予了多种动物的特性和“神力”,人们相信这些融合了多种动物特征的“神兽”能够保护部落免受自然灾害的侵害。《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反映出商代社会与凤鸟之间存在着深厚联系。在甲骨文中,商族高祖王亥的“亥”字上冠有鸟形图案,这进一步印证了商人将玄鸟视为图腾崇拜的宗教与文化标志。饕餮作为原始时代极具标志性的图腾之一,烙印着人类从蒙昧原始向礼制文明过渡的轨迹。它的诞生既是原始图腾崇拜的具体表现,更是古人生命意识觉醒与彰显的有力证明。例如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杜岭方鼎(见图8),鼎身的饕餮神秘威严,线条刚硬,其周围环绕着乳钉纹等几何图案,展现出庄重肃穆的气势。在原始人类的眼中,世间蕴藏着一种

① 图片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5。

② 图片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5。

③ 图片引自:周泗阳,万山. 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184。

神秘又永恒的生命力,被视为万物本源。鉴于当时人们对生命真谛的理解有限,他们对这种无限生命力的崇拜与遐想逐步凝聚,并深植于图腾崇拜之中。人们渴望图腾所带来的神秘力量,并继承祖先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在铸有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的青铜器上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现,更激发人们形成顶礼膜拜思想,这也是奴隶制王朝的一种体现^[15]。



(a) 杜岭方鼎实物图

(b) 杜岭方鼎局部纹样

图8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杜岭方鼎

注:图8(a)来源于笔者拍摄于河南博物院;图8(b)来源于笔者绘制。

(二) 尊神重鬼的思想观念映射下的青铜纹样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揭示了“尊神重鬼”作为商人社会思想核心特征之一。殷墟甲骨卜辞中的祭祀卜辞同样证实了商人对鬼神崇敬的狂热,特别是在祭祀活动中,“尊神重鬼”的理念表现得尤为明显。《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话强调了国家大事乃祭祀与战争。青铜器上主要用于祭祀鬼神祖先,其上镌刻的各种神秘诡异的纹样,融具象和抽象元素于一体,多数追求统一、对称和均衡的和谐美,既神秘又庄重,与商人在祭祀鬼神和祖先仪式中所追求的庄重肃穆氛围完美契合。商代晚期青铜纹样的装饰艺术更具有强烈的崇神特性,以兽面组合造型为核心,以动物纹为主体风格,并辅以繁复华丽的“三叠法”装饰技法。这一独特风格正是在尊神重鬼理念下,融合原始图腾崇拜意识所形成的。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常以牛角形态呈现,羊的形象也频繁出现,如牛首兽面纹、四羊方尊等。

段勇^[16]指出,兽面纹的原型或许为牛、羊、亥等祭祀所用的牺牲。在古代祭祀活动中,出于敬畏而避免直接刻画祖、神的形象,所以与祖、神最接近的事物便被赋予了祖、神的象征意义,据此兽面纹的终极象征指向了“帝”。商人好酒且认为神也嗜饮,嗜酒实则映射了他们对神灵的尊崇与祭祖的虔诚。酒作为连接人与神的媒介,在酬神祭鬼的仪式中不可或缺,承载着商人的精神信仰。此外,在巫师施行通神法术的仪式中,酒能助力巫师进入激昂幻想、近乎痴迷的状态,从而营造出与神灵相通的幻景。此时

流行的模仿动物形体的酒器与动物纹样具有同样的功能意义。这些酒器以动物躯体作为中空的尊体。例如图9所示的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妇好鸛尊,它巧妙地将多种动物元素融合于一体,并非单纯地模仿鸟类,而是创造出一种集多种动物特征于一身且被神化的鸟类形象。它不仅展现了鸛的独特造型,更在装饰上进行了非凡的创意延伸。其表面布满花纹,喙与胸颈处饰有蝉纹,颈后饰兽面纹,高冠外侧饰羽纹,内侧饰夔龙纹。妇好鸛尊纹样纷繁复杂,造型凝重威严,超越了普通酒器的范畴。青铜器形制与纹饰的独特性,揭示了商人“尊鬼重神”的信仰体系。这并非单纯基于实用或功利目的,而是一种超越外在仪式、源自民族灵魂深处的宗教情感的流露,是对深沉、神秘风尚的执着追求,体现了商人内心对超自然力量的虔诚与敬畏。



(a) 妇好鸛尊实物图

(b) 妇好鸛尊局部纹样

图9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妇好鸛尊

注:图9(a)来源于笔者拍摄于河南博物院;图9(b)来源于笔者绘制。

(三) 尚德保民的理性思维映射下的青铜纹样

西周早期,人们崇鬼敬神的热情不亚于商人,但周人在此前提下进行了重要的制度调整。他们引入“敬德”理念,重整礼制秩序,大力推行“礼乐制度”,以此来规范社会行为和强化道德观念。周人虽也有祭祀,但不同于前代商人的宗教狂热,而是逐步形成一种有伦理观念、等级制度严格的礼仪活动。《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可见周礼的制定旨在“观德”,观德的最终指向是“养民”,“德”的提倡和“礼乐制度”的建立为周人的宗教思想增添了理性色彩,使得周礼不仅是社会规范,更具备了崇尚德行、庇护民众的理性精神。

《论语》有曰“不学礼,无以立”。礼的推行无疑为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奠定了基石。周人极为重视音乐在礼仪中的作用,仪式在外在形式上区分社会阶层的尊卑贵贱,而音乐则促使人们在心理及

情感上认同礼制秩序。西周中期,人们逐步摆脱了对天地和鬼神的盲目狂热崇拜,开始将关注的重点由神秘的天际转向现实的人间生活。受具有浓厚理性色彩的礼乐制度影响,青铜礼器的纹饰发生了显著变化。殷商时期神秘而诡谲的审美观念逐渐被理性化的审美思想所取代。尽管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仍保留了商代肃穆庄严的特点,但西周中期以后,用于祭祀的仿动物形体青铜器逐步减少,神异的动物纹也不再盛行,取而代之的是手法写实、具有理性思维的几何纹样。

例如图10所示河南博物院馆藏西周中后期的邓公铜簋,其几何纹样的秩序井然,既体现了周礼的理性精神,又与西周社会对和谐、稳定秩序的追求相呼应。这种纹饰的变化,与周礼对理性精神的强调密切相关。周人有意淡化和弱化商代青铜器上那些神秘诡异的动物纹饰,转而采用更为简洁、规整的几何纹样,这不仅标志着周人在艺术上的自主创新,也反映了周人对理性思维和礼制秩序的重视。总之,西周青铜器无论是在承载的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呈现出向人间化、世俗化及理性化迈进的趋势,这一转变正是西周社会风貌和思想变迁的物化体现。



(a) 邓公铜簋实物图



(b) 邓公铜簋局部纹样

图10 河南博物院馆藏邓公铜簋

注:图10(a)来源于笔者拍摄于河南博物院;图10(b)来源于笔者绘制。

四、结 语

本文通过对商周青铜纹样图像资料和古籍文献资料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青铜纹样的演变特征,并进一步剖析了纹样与其蕴含文化内涵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艺术特点来看,青铜纹样具有对称性、重复性和层次性的特点。在演变特征方面,纹样组合规律发生如下变化:从“简单几何纹样+动物纹样”转变为“复杂动物纹样+云雷地纹”,继而演变为多种几何纹样相互组合;纹样组织结构的变化为:由单层带状二方连续式纹样发展为三层二方、四方连续式纹样,之后又转变为单层带状

二方连续式纹样;纹样装饰风格的变化趋势是:从古拙粗犷迈向凝重繁丽,再趋向典雅疏朗。青铜纹样的演变不仅是艺术表现手法的进步,更是社会思想和文化价值观变迁的缩影。它承载着商周时期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体现了古人的精神信仰和审美观念。从图腾崇拜的精神信仰,到尊神重鬼的思想观念,再到尚德保民的理性思维,映射出古代社会从原始宗教到礼制文明的演进历程。青铜纹样为文化传承以及当今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灵感。后续对青铜纹样的研究应当立足于现代文化背景和审美需求,致力于探索如何将这些古老纹样创新融入现代社会,通过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让古老的青铜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张庆,方敏,杨朝辉.论楚国丝绸中的蟠龙飞凤纹与商周兽面纹的传承关系[J].丝绸,2020,57(1):55-61.
- [2] 黄厚明.青铜器纹样研究的两种视野与“关系美学”的建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60(2):115-124.
- [3] 艾兰,韩鼎.郑州商城青铜大方鼎造型与纹饰研究[J].中原文物,2022(1):116-123.
- [4] 齐秀芝,贺雪梅.知识图谱视角下的中国青铜器可视化分析[J].包装工程,2022,43(10):396-406.
- [5] 喻晓辉.商周青铜器纹饰分析[J].文化产业,2023(1):67-69.
- [6] 常冉,章海虹,郭鲁宁.殷墟青铜器纹样在丝绸文创产品中的创新设计应用[J].包装工程,2024,45(1):436-444.
- [7] 王珺英.青铜艺术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J].印染,2022,48(10):88-89.
- [8] 周泗阳,万山.中国青铜器图案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 [9] 李泽厚.美的历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10]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91.
- [11] 单永慧.基于商周青铜器纹样的创新设计应用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23:22-23.
- [12] 杨远.夏商周青铜容器的装饰艺术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7.
- [13] 孙雪.“纹”以载道—青铜纹样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22:24-25.
- [14] 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54.
- [15] 杨远.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165.
- [16] 段勇.商周青铜器幻想动物纹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54-155.

(责任编辑:陈丽琼)